

#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

孙银光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通过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生存发展等根本利益的高度关心和自觉维护而形成一套复杂的价值体系。然而，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反教育的倾向。反思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研究者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反教育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深刻揭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它的发生机制是：学校传递给学生规整的知识，通过刻意塑造的氛围培植情感，并以集体为中介训导行为以实现爱国主义教育。规整知识、培植情感、训导行为并不是孤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配合以形成合力的作用。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发生机制的廓清，有利于明晰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

**[关键词]**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规整知识；培植情感；训导行为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4)07-0069-05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道德教育的主题。即使是日益多元的现代社会，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并没有动摇，而是愈发内隐，依然持续“印刷”出一批批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国家化色彩异常浓厚，尤其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它们都发现在自己的公民中培养集体性的自我本位意识的益处。”<sup>[1]</sup>爱国主义教育的初衷是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利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福祉。然而，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却出现了反教育的倾向。要具体理解此问题，我们可以从知识、情感、行为三个维度来揭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反教育现象的发生机制。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部分，指向于人的知、情、行诸领域（意志可以分解为情感和行为），具体而言，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诉诸爱国主义知识的传

授来实现学生此方面的认知发展，进而将爱国主义内化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最后外化为爱国主义行为。

## 一、规整知识：爱国主义教育的认知性实践

阿尔都塞认为，作为国家教育机构的学校以“教授知识”为中心，从形式上保证了对于统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控制。这种形式上的可能为爱国主义教育认知性实践的反教育在学校的发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它先对知识进行筛选，进而将筛选后的知识建构成理想的文化体系，并作以合于利益的解读，然后将个体送入其中进行锻造，促进学生形成关于爱国主义概念的认知，模塑出思想上合格的“接班人”。

### （一）筛选知识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中，国家培养合格的官僚和忠诚的子民是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sup>[2]</sup>近代学校教育源起于普鲁士为提高军官的文化

孙银光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430079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研究”（12JZD002）的阶段性成果。

修养，主要在中央的控制下发展，国家概念的灌输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在学校中大行其道，而手段之一就是过滤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知识。通常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审查文学作品。审查的目的是祛除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要为学生提供引导其行为的理想楷模。这种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在语文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致使很多文章都带有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色彩，如《海燕》《荔枝蜜》《最后一课》《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二是操纵历史教学。苏格拉底认为，既然我们不能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应当使它变得有用”。这种削历史之足以适国家之履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历史始终是构造国家神话和赢取民众爱国热忱的工具。五千年辉煌历史和近代百年的历史变迁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增加民族自豪感，进而生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三是净化音乐内容。音乐的教化作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楚，好的音乐具有洗涤心灵的作用。教育部门在音乐传递之前就会对内容进行选择，让音乐可以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爱国主义教育正是通过对音乐内容的限制，实现深入学生心灵的效果。如，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热爱共产党》《共产儿童团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

### （二）建构知识

阿普尔认为，“学校不仅‘加工’人而且‘加工’知识，它们增强并赋予与不平等的经济形式相关联的特定类型的文化资源的合法化”<sup>[3]</sup>。筛选准许进入学校的知识只是提供一种线性的教化方式，并不能保证让学生全方位地接受特定刺激。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想对学生起到合力的作用，进一步的手段是建构合适的知识体系甚至是构造理想的文化环境，让学生置身其中，受到筛选之后知识的熏染。学校作为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渠道，对传统、对惯例往往具有巨大的依附性，日日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必定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一直以来的制度惯例，作为集体行动的构成性要素，往往会非常“习以为常”，因而能够轻易避开人们的理性审视。<sup>[4]</sup>无意识的传递才能让关于爱国主义的知识深深扎根在学生的心灵中，也会在悄无声息间植入深刻的记忆。除了筛选之后的知识，还可以建立服饰制度，如少先队的红领巾、少先队队服等；可

以建立班会制度，如定期在班级举行班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建立典章制度，如每逢周一早晨的升国旗、唱国歌。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让教师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对处于强烈模仿阶段的小学生。这样就可以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知识建构体系，让学生时时刻刻处于爱国主义氛围之中，受到浸染，以达到教育的效果。

### （三）解读知识

“看看历史事件是如何弄成廉价的木偶戏，几个牵线人被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导者。”<sup>[5]</sup>学校会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已建构的知识进行利于自身的解读。于是，根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就可能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尤其当意识形态渗入到学校之中的时候。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作“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为它是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拳乱”；大陆则没有论及义和团的局限性，篇章集中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叙事“并不显示，并不模仿……（它的）功能也不是去‘再现’，而是要去建构一种景观”<sup>[6]</sup>。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会对历史事件或者当代时事作出独特的解读，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符合自身利益知识的颂扬。对这部分知识的颂扬有利于塑造国家正义光辉的形象，赢得广大群体的拥护和支持。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动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等。二是对损害自身利益知识的贬斥。对这部分知识的贬斥一方面是为了祛除会对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只留下正面的理想楷模；另一方面是有益于在对比中凸显自身的光辉形象，侧面论证自身利益的合理性。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驱逐和史诗内容的净化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爱国主义教育对知识的独特解读，让知识处于更加规整的状态，进而让学生领会到国家的正义和权威，由此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认知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本意是向学生传授关于爱国主义的知识，促进学生此方面认知的发展，让学生对爱国主义拥有清醒的认识，进而自主自觉地做出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然而，爱国主义教育的认知性实践却通过筛选、建构、解读知识达到规整知识的目的，将学生置于整齐划一的知识体系中“回炉再

造”，一层的选拔，一步步的锻造，让学生在被蒙蔽的环境中形成错误的认知，最终塑造千人一面的机械拥护者。在规整知识的情景中，学生很难获得发挥独立个性的空间，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消失，逐渐成为缄默的个体，而这样的教育实践完全偏离爱国主义教育初衷。

## 二、培植情感：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实践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学生中制造出一种愿意为保护国家而战斗甚至牺牲的心理。这种对国家的忠诚，在现代国家中主要依靠建立一种情感的依恋来实现。因此，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完整的，爱国主义需要进一步内化，到达情感的层面。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实践中培植情感主要利用群体的心理特点，先制造爱国主义氛围进行情感熏染，并以榜样为中介对个体进行情感暗示，最后通过将国家理想转化为个体理想以达到情感控制的目的。

### （一）情感熏染

“在群体中，不管什么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完全可以让个人为了集体利益随时牺牲他的个人利益。”<sup>[7]</sup>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主要在群体中进行，这是由群体的特点造成的。一是群体冲动急躁：乌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的影响，而是脊髓神经……群体不但冲动而且多变。和野蛮人一样，很难理解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同时也没有承认这种障碍的打算，因为数量上的优势使它感到自己不可抵抗”<sup>[8]</sup>。这样的心理优势带来的是，群体中个体理性的湮灭、约束的消失，让群体在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指挥下，敢于将自己本能的情感欲望爆发出来。二是群体目光短浅：相对于个体具有掌握反应行为和规划未来的能力，群体对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几乎都是无能为力。个体的有意识行为将被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替代，它只知道按照本能发泄自己的欲望，却极少考虑后果。三是群体盲目轻信：一些谣言可以轻易在群体中广泛传播的原因是，群体中的个体极端轻信。那种个体具有的理性反思能力在群体中会很快消失，于是，人们会被一点火花引燃内心的激情，让自己陷入无理性的泥潭之中，法国大革命中激情的群体就是很

明显的例子。个体被教育去热爱和保护国家，虽然人们正如被教育的那样去做了，可是他们只是处于那种情感的氛围之下不由自主地做出行动，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由此可见，群体冲动急躁、目光短浅、盲目轻信的缺陷，很容易被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所利用，进而使爱国主义情感在群体氛围的熏染下发生偏离。

### （二）情感暗示

情感暗示可以达到隐性牵引的效果，而为达到情感暗示的目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主要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榜样来进行暗示。榜样在教育中的作用从来都没有被低估，也经常被使用，各种学习标兵、先进个人层出不穷，“抓典型”的工作方法也是对榜样的迁移。良好的榜样的树立可以给学生造成正面的强烈心理暗示，多次重复甚至能达到类似真理的效果。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对榜样的利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政府会通过学科内容的审查和历史教学的操纵，使学生接受的信息和国家的指令相一致，以便塑造关于自身的光辉形象。苏格拉底也说过，人们既然无法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便可以按照需要选择并解释历史材料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其次，挑选或塑造出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生命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众多榜样。古斯塔夫·勒庞在研究大众心理学时发现，“支配着大众的不是论证，是榜样。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和其他人作对并被无意识的群众所模仿”<sup>[9]</sup>。那种不惜一切也要保全国家利益的榜样，会给受众异常强烈的冲击，让群体之中的个人“不假思索”地做出类似的行为。最后，通过以上的事例加以暗示，让学生相信自己的国家和统治者的光荣和公正，以及内隐其中的政权合法性。这里面存在一个被混淆的逻辑：既然有如此多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奋不顾身，甚至是牺牲生命，那么国家的利益确实是值得维护的，爱国肯定是正确无疑的。其实，榜样只是个例，并不能说明普遍的价值，但其中的情感暗示作用毋庸置疑。

### （三）情感控制

情感控制一般通过树立共同理想来实现。理想之所以可以起到情感控制的作用是因为它通过塑造美好的愿景诱导人们，让人丧失理性地献身其中。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认为，国家通过植入思想和在心灵中树立理想来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sup>[10]</sup>人们支持国家

是因为他们被教育去爱这个国家，并把国家的理想内化为个人的理想，这种个人无力摆脱的理想被施密特称为“大脑中的轮子”。对于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理想被用来塑造他们的人格，逐渐形成“大脑中的轮子”，使学生的情感受制于国家，不能理性独立地思考。理想的诱导之所以可以被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混淆了可设想和可能之间的界限：理想既然是可设想的，它就是可能的，进而它就是应该的。<sup>[1]</sup>这种界限的混淆导致学生为自己应该成为的“理想”而牺牲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并不拥有自我，而是被理想支配着。同时，理想是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树立的，如“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这些并不服务于个人的欲求，甚至当理想与个人的欲求发生冲突时还会压制个人的需要。它给个人塑造一个美好的愿景，说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让我们牺牲暂时的利益以在将来获得丰厚的回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试图通过统一纷乱的个人意识，培养出愿意为保护国家和社会体制而献身的公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他们却过着盲目的生活。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其目的是让个体怀有对国家理性深刻的情感，在某个激动人心的事件影响下，这种深刻的情感会让无数孤立的个体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进而形成统一的集体，为维护国家利益爆发出让人惊异的力量。然而，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实践培植的却是一种专制型情感，试图通过情感的制控达到控制个人的目的。它把学生当成无生命的客体，也间接培养学生将他人定位为“我与他”的陌生关系，而不是“我与你”的情感交互关系。这样带来的恶果是：共同维护权威政府时迸发激情，而相互之间却陌生冷漠。

### 三、训导行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性实践

爱国主义教育只有落实到行为层面才算完成，而爱国主义行为也会反过来深化爱国主义认识和强化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行为应该是人们在正确认识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下，发自内心的自觉做出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性实践却通过在集体中训导爱国主义行为，湮灭

个体意识，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

#### （一）集体行为驯化

“教育工作的深远意义……在于挑选和培养人们需要的人……从道德角度讲，对集体主义的需要便是一种正当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与他的集体相连，要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奋斗的信念，带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活着。”<sup>[2]</sup>马卡连柯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学会生活在集体公社之中，给每个学生都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从而使他们成为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个体作为集体的一个部件，从而塑造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性实践主要也是通过集体主义教育进行，如班集体意识的强化。教师对学生不良品性的评价也建基于“没有一点集体荣誉感”。并且，集体通过约束个体意识来建立。集体将个体淹没，个体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一个不太重要的零件，于是，个体的需求、愿望也就被忽视。斯大林说过：“像园丁培育果树一样，应当小心谨慎地培育人民。”<sup>[3]</sup>教师要像“园丁”一样给学生“浇水”“松土”，甚至修剪不和谐的“枝节”，并让个体时刻处在“果园”之中，湮灭个体意识，规范个体行为。高中、大学的入学军训，通过方阵队列和正步齐走训练，就是强化个人处于集体之中的意识，构成整体，相互制约，归根结底是对个体行为的规训、集体意识的强化。

#### （二）从众行为扬升

个体一直处于集体的氛围之中，很快就会丧失自主意识、理性思维，结果不是妥协于权威，就是屈从于群体。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持有这样的观点，人民意志的真实意蕴要么是多数人的意志，要么是群体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究其本身不过是最有权力者的意志。因此，集体中的从众行为实质上是跟随权力者的脚步。我们还知道，“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重复，重复地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因此，和过去一样，教育体系负有传递传统价值的职责，这是正常的事”<sup>[4]</sup>。一直被重复的说法会逐渐进入我们无意识的深层区域，而那里正是我们行为动机形成的地方。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人们不会记得，也不会关心那个不断重复主张的人是谁，我们最终会深信不疑。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它通过不断重复,具有了令人惊异的威力。这种重复的功能使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从众行为的扬升变得更加便利。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正是借助重复让爱国的理念充斥学生的四周,让学生时时浸染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制造的氛围之中,由此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进而在个体的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让学生把爱国看成是无须证实的真理而最终接受它。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中的部分人会或多或少地对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合理加以反思,甚至予以自觉抵制。然而,随着周围的个体信守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所宣传的观点,为了被集体接纳,个体也会慢慢成为惯例的依循者。

### (三) 个体行为贬斥

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如何消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限制个体的自私自利行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的做法是:牺牲个体利益,保全集体利益。于是,个体的行为理所当然就应该受到约束。这里面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给出的论证是:一般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要坚持以集体利益为重,并愿意放弃或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从长远看,坚持集体主义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大保护。这里面集体利益代表的就是国家利益。由此,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个体利益理应被牺牲,个体的行为就更加不值一提。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还通过另外两个方面来说明贬斥个体行为的合理性:一方面是教导人们相信,国家有能力去认识什么是共同利益。“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其说服能力,它使人们相信他们的领导者能够获取关于正义的知识,并且公民因此应当为国家的命令而牺牲自身。”<sup>[10]</sup>既然国家能够获取共同利益,那个体的行为就被贬斥为实现集体利益的桥梁。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将个体的情感束缚在国家的象征物之上,如国家理想、国家利益等。国家的角色上升成为神圣的存在物,让个体难以兴起抗拒之心,最后退化为“红砖”和“螺丝钉”。因此,受过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人们会乐于为国家规定的共同利益去牺牲自我利益,个体的行为也不再重要。

爱国主义行为可以体现个体浓烈的爱国主义情

感,表现为对国家的忠诚。然而,爱国主义教育行为性实践中对个体行为的驯化,限制了学生基于理性思考做出的行为,他们不再是自我行为的主导者,而是沦落为行为的执行者,也从不思考行为背后的理由。这种只知其果、不知其因的行为个体的培养,偏离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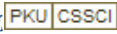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几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包含、彼此融合的。知识、情感、行为三个层面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以完成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由规整知识、培植情感、训导行为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系统极有可能拒绝学生的理性思维,挤压学生的反思空间,让维持爱国主义仅仅依靠冲动和激情,它的目标是培养出千人一面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这是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走向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会不会挤压个体理性反思的空间;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盲目的爱国主义是不是真正的爱国,如何才能做到理性爱国。

### [注释]

- [1] 约翰·S.布鲁巴克.教育问题史[M].单中惠,王强,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65.
- [2] 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M].王春华,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35.
- [3] 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9
- [4] 傅淳华.论学校制度情景中的教师平庸之恶[J].教师教育研究,2013,(4).
- [5][10][15] 乔尔·斯普林格.脑中之轮[M].贾晨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2、67、79.
- [6]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60.
- [7][8][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吴松林,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55、62、140.
- [11] Stirner, M. The Ego and His Own: The Case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Authority[M]. trans. Steven Byington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3: 330-335.
- [12][13] Makareno, A.S. The Collective Family: A Handbook for Russian Parents[M].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7: 32、14.
-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韦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85.

(责任编辑:张 蕾)

#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

作者: [孙银光](#)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430079](#)  
刊名: [教育科学研究](#)   
英文刊名: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年, 卷(期): 2014(7)

引用本文格式: [孙银光](#)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期刊论文]-[教育科学研究](#) 2014(7)